

# 应变与困境

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

白文刚·著

文史博士文库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应变与困境

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

白文刚·著

文史博士文库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白文刚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3

(文史博士文库)

ISBN 978-7-81127-169-0

I. 应… II. 白… III. 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7195 号

---

**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

著 者 白文刚

责任编辑 冬 妮

封面制作 蔡玉生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蔡 翔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140

网 址 <http://www.cu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1127-169-0/K · 169 定价：2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 序 言

自从有了国家,人们就生活在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之中。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同时既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行使霸权、又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之内行使霸权的话,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

意识形态控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要看谁是控制的主体,控制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要把这种控制导向何方。反动的阶级、反动的政权要把意识形态控制作为倒行逆施、实现一己私利的工具;而进步的、革命的政治力量则要把这种控制作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统一认识、造福社会的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上的变动或改革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控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和政权的兴亡。因此,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控制,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影响。而对意识形态控制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控制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和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项目。

白文刚同志的专著《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是在他撰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修改而成的，对这部书稿他是下了相当工夫的。关于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受到学界关注，只是从八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但研究较为零碎，研究主题也不够突出，系统探讨的研究成果暂付阙如，而文刚同志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清末新政时期这一时间段对晚清意识形态控制做了较为详细的探析，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也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作者在研究中注重问题意识，其内容涉及思想史和政治史两个领域，跨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亦较有新意。在学术观点上，作者提出了清代异端与“邪说”不同的看法，认为“中体西用”是清末新政时期官方的核心意识形态，并着重挖掘了科举制度和旌恤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这些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个进步。也体现了作者在科学研究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求新、求真的探索精神和务实态度。

诚然，如作者所说，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书稿也不可能囊括清末意识形态控制的所有重要内容，提出的一些观点尚待检验，对这一颇具挑战性题目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我们期待文刚同志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

杨东梁

2007年10月31日

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

# 目录

## CONTENTS

序言 / 1

绪论 / 1

### 第 1 章 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 / 17

1.1 清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涵 / 18

1.2 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危机与意识形态调整 / 34

### 第 2 章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新政时期的演变 / 55

2.1 清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56

2.2 新政时期主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演化 / 78

### 第 3 章 新政时期意识形态控制制度的变革和延续 / 102

3.1 科举存废与意识形态控制 / 103

3.2 传统意识形态控制制度在清末新政时期的延续 / 124

2 ◇ 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

第4章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 147

4.1 学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 148

4.2 对留学生的思想监控 / 176

第5章 新政时期的新闻出版控制 / 187

5.1 新闻出版法规的制定 / 188

5.2 频繁的“违禁”报刊书籍查禁与处罚 / 200

第6章 清末意识形态控制的失败 / 222

6.1 清末意识形态的失控 / 223

6.2 主要失控原因分析 / 234

余论 / 249

主要参考文献 / 252

后记 / 262

## 绪 论

---

## 1. 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法国著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阿尔都塞在他那篇影响深远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指出:从意识形态一般的角度而言“意识形态没有历史”。<sup>①</sup>他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同时既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行使霸权、又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之内行使霸权的话,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sup>②</sup>

这意味着至少从国家建立的那一刻起,人们就生活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其中既包括已经作古的前人,也包括写这本书的我和阅读这本书的你,甚至那个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美国人丹尼尔·贝尔本人也无可避免地处在意识形态的包围和控制之中。

既然如此,研究意识形态控制也就具有现实和永恒的意义。意识形态控制与人类文明进步史形影相随的历史提醒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批判予以彻底摆脱,而且它也并非都是历史发展的阻力——社会的稳定、历史的变革都需要有与

---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②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 146. 如注①所示,国内已经有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的译文,另外还可见方杰译《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关于本句的翻译,现有汉语翻译似均有语病,故本书据英译版本,并参考现有汉语版本进行了重译,原句是:No class can hold state power over a long period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exercising its hegemony over and in the 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这里所谓“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实行霸权”,是指能够掌控各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所谓“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之内行使霸权”,则是指其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得到顺利传播,占有独尊地位。

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凝聚人心、统一认识。换言之,我们所关心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特点、成效和它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

在改革或历史的变动时期,是意识形态控制容易面临挑战和威胁的时刻,而意识形态控制成功与否,又直接关系着改革的成败和政权的兴亡。世界历史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个论点。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给我们提供了最鲜明的对比。前者在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sup>①</sup>而后者则由于“文化核心”遭到有预谋的破坏,在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的改革中走向解体。<sup>②</sup>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警示人们:社会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整合和控制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对此的研究也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晚清是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统治者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物质方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亘古未见的危机。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清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某些改革措施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积极采取了应变策略,包括提出新的核心观念进行思想整合和推行各种各样的控制措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始终无法摆脱意

① 关于此点,在学界应该是一种共识,相关内容可以参阅《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依田意家著,雷慧英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明治维新》(米余庆著,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等。

② 见〔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意识形态控制领域面临的困境。清末新政时期,<sup>①</sup>清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以失败告终,不仅其推行的“新政”半途而废,而且对中国长达 267 年的统治也仿佛在一夜间就土崩瓦解——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仅仅一个月就有多半个中国脱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令人印象深刻!清末新政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迅速覆亡当然有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意识形态失控,王朝合法性的丧失无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就研究现状来看,对前者的研究已经有了连篇累牍的丰硕成果,而对后者的研究却几近空白。如上所述,意识形态控制的成败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历史,才能进一步深化对晚清历史转型的认识。清末意识形态控制何以失败,它难以突破的特殊困境是什么?这是本书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极度缺乏前期研究成果的课题,本书首要的任务是厘清清末新政时期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上述这

① 本书所指清末新政的时限是从 1901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改革诏令至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倒台这十年。我国学界传统上把 1901~1905 年视为清末新政时期,而将 1906 年至清王朝灭亡这一段时间称之为清王朝的“预备立宪”时期,人为地将十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例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权威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就是这样划分的[参见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 1994 年版。这是我国各高校广为使用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但严格来说,清末十年的改革是一体的、连续的。不仅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在 1905 年之后继续出台,而且“预备立宪”也是新政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其目的和指导思想并没有超越新政的范畴。所以不宜将这十年在中间割裂开来。事实上许多著作就是把它作为一体来处理的。如由美国中国史专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就以“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为标题来阐述这一时期的改革[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36~477 页]。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也是以整体十年来研究清末新政的,如吴春梅所著《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等等。

些问题是本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的问题意识所在。

对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深刻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显然不言而喻。

在正式开展这项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本书最主要的概念——“意识形态”——作一界定。自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以来,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仍然日复一日地涌现。争论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哲学研究的任务,作为一部史学论著,本书主要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这一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明确和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国家统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没有对意识形态作过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特征和功能做了多方面的描述,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本质。<sup>①</sup>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②</sup>换言之,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之后,包括恩格斯、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本质、功能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sup>③</sup>与本书研究相关,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他们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当今世界影响巨大。虽然像每一个理论一样,他们的理论也遭到了后来者的批评和补充,

① 周宏的《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比较详细地梳理了马克思本人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马克思所创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供读者借鉴。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③ 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及其内涵。

但是批评者是充满敬意地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对其提出批评的,并没有根本的修正(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领导权”概念,认为依靠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思想来团结民众是统治手段之一,任何希望获得政权或维持政权的阶级都需要争夺这一领导权,而“领导权依靠社会的‘文化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对世界和人、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总和,包括大量象征和形象、传统与成见、许多实际的知识 and 经验”。<sup>①</sup> 简而言之,这个“文化核心”也就是意识形态。

在葛兰西的基础上,阿尔都塞更进一步,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揭示。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sup>②</sup> 为了充分说明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作用,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著名概念,认为它们是与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并立的另一种国家机器,它由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传播的、文化的等不同性质的机构组成。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对本书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把握和分析有一定帮助,如德国的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将意识形态分为特殊和总体两种含义。前者指对论敌的某些具体主张表示怀疑,后者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sup>③</sup> 这种区分对我们理解晚清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以上述意识形态概念的讨论为基础,本书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基于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却以代表全民的姿态出

①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②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和第361页。

③ 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5~71页。

现的一整套关于现实世界和社会秩序的认知的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实践性是它的特点。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都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指导国家政治和整合民众思想是它最核心的目的和任务。简言之,意识形态旨在提供引导人们对某一社会秩序合法性的认同模式。这个定义表明,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能否成功地控制意识形态是能否成功地控制国家政权的重要条件之一。

## 2. 学术史回顾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告诉我们,统治集团是通过一套控制体系和相关手段来实施对被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控制活动的。所以研究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意识形态的控制体系及相关手段,简言之,就是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运作。

大概是受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范式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从正面探讨晚清政府实施社会控制的研究成果问世,海峡对岸的台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大陆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对晚清政府同样抱着批判态度,他们似乎也没有正面研究晚清政府实施社会控制的成果诞生。当然关于晚清意识形态控制的研究成果也就暂付阙如了。

这一时期对该问题曾经予以关注的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大概当属美籍华人学者萧公权先生的研究。在其著名的《乡村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sup>①</sup>一书中,萧公权用第六章一整章来谈 19 世纪中国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他认为乡约宣讲系统是当时乡村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此外还有乡饮酒、地方

①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祭祀和学校等辅助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他还对这些控制手段在19世纪的作用的式微及其原因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萧公权的研究是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关于19世纪中国乡村意识形态控制方面最有分量的成果。美国学者芮玛丽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也注意到了意识形态控制对晚清政府维持统治的重要性,并以教育为中心扼要论述了“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举措。<sup>①</sup>另外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泰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也有一些篇幅介绍了清政府试图维持和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举措。<sup>②</sup>但是作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他更多的是把这些举措看成了阻碍中国变革的落后举动,换句话说,他只是在论述有关现代化变革当中提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控制活动,并非刻意去论述当时的意识形态控制。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思想史研究内容更单调一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重要思想家个人的思想,这样的成果层出不穷,难以计数。显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群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能以思想家的思想来代替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们没有关于晚清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出现,就更谈不上意识形态控制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清统治集团、社会思潮等课题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和晚清意识形态控制相关的成果也不断问世。

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无非就是灌输和宣传官方意识形态,反对和限制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其他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研究

①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晚清意识形态控制,首先就要涉及晚清的官方意识形态。晚清的官方意识形态经历了由“理学经世”到“中体西用”的转变。对于这两种晚清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学界多有研究。前者以史革新的博士论文《晚清理学研究》<sup>①</sup>和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的《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为代表。<sup>②</sup>《晚清理学研究》对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历史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而《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则主要阐述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对“同治中兴”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同治政府对程朱理学的重视和推广,可以被看做是官方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的举动之一。“中体西用”作为晚清回应西方冲击的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一直以来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得到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当属丁伟志、陈崧合著的《中西体用之间》。<sup>③</sup>该书比较完整地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萌芽、形成、嬗变和分解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历史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交融,是迄今为止内地研究“中体西用”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台湾学者薛元华的《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官定意识形态的西化理论》,<sup>④</sup>也是一本全面分析“中体西用”思想的论著。该书的主要贡献是厘清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中体西用”思想的不同内涵,并分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总体源流及各人的内在理路。作者的目的在于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此外有一些论文对“中体西用”思想提出了新的看法,非常值得注意。传统观点认为,“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论文提出了新的看法。如

① 北京师范大学1992届博士学位论文,藏于国家图书馆。

② 《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年版。

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sup>①</sup>、郝晏荣的《“中体西用”与晚清意识形态》<sup>②</sup>、贾小叶的《“中体西用”论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sup>③</sup>，都指出“中体西用”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而是在甲午以后才逐渐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的。这些新观点的提出对本书关于清末新政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内涵的判断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调整意识形态以整合各种社会思潮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之一，但最常见的还是采取法律、行政、教育等措施，对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维护，并同时非官方意识形态进行限制。虽然没有系统探讨这方面问题的著作和论文问世，但是一些现有研究成果还是零星涉及了相关内容，这些研究成果也是本书写作的基础之一。近年来，一些关于晚清文化政策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晚清的意识形态控制措施。如董从林的《晚清咸同年间官学文化方针下的“崇正辟邪”》<sup>④</sup>和《传统官学在晚清的没落》<sup>⑤</sup>，张小莉的《晚清文化政策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sup>⑥</sup>，高照明的《湘军与晚清文化秩序的重建》<sup>⑦</sup>等等。关晓红在《晚清学部研究》一书中也在第七章叙述了学部对清末学生采取思想控制的措施。<sup>⑧</sup>

传播媒介是影响民众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明确地体现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控制态度。著名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在中国现代报学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中就提到了清政府对报刊的限制措施。<sup>⑨</sup>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也有叙述清政府对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

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④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河北学刊》，2000年第1期。

⑥ 《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⑦ 《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⑧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⑨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